

記譚嗣同居士

凌俊夫

——慈心悲願的一生

譚嗣同居士是湖南長沙瀏陽人，生於前清同治四年（西元一八六五年），字復生號壯飛，其父譚繼洵曾官任湖北巡撫，譚居士生於官宦之家，得以博覽群籍，能寫一手好文章，唯因慈母早逝，遂養成他心危慮深的個性，自恃好任俠劍術，弱冠以後曾到新疆從軍，後投於巡撫劉錦堂幕，在近十年期間曾往來西北及東南各省，視察各地風土，廣交豪傑之士，甲午戰後目睹清廷腐敗，奮發提倡新學。

當時，聽聞康有為在北京倡導「強學會」，頗獲天下志士、學者支持，曾遊京師想謁見請益，唯康早已離京南下廣東，而失之交臂，然自識康的講學宗旨及經世條理，則非常感動、喜躍，自是以康的私塾弟子自稱。其後不久，以父命捐官為後補知府，時至上海與強學會同志，研究學術及討論天下事，聽說一代佛學大儒楊仁山居士，在南京創辦「金陵刻經處」及「梵文學堂」（祇洹精舍），學堂僧俗兼容，以昌明佛教，又有佛學研究會之設立，每月一會七七講經，遂親近楊老居士

並潛修佛學，期從佛學的深藏妙理喚起民智改變民習，從而開始閉戶養心讀經，探研儒、佛義理精奧，最後將探研的心得貫通康的講學宗旨，成《仁學》一書，書凡五十篇分為二卷，其後，與江南各省志同道合者試辦新政，棄官回湖南，相與論愛國之理，求救亡之法，而先從湖南一省辦起。

楊仁山老居士晚年在金陵（南京）自宅成立私「祇洹精舍」及「金陵刻經處」，試圖將從清朝以來逐漸衰敗的中國佛教，提升回魏、晉、隋、唐諸朝的鼎盛，老居士可稱為一位使佛教起死回生的樞紐人物。老居士的研究佛學及闡述的佛學思想，是從《大乘起信論》開始益發，他對《起信論》的讚語，在其「等不等觀雜錄」中記載最多，真可謂俯拾皆是，如：「……有馬鳴菩薩所作起信論，文僅一卷、字僅萬言，精微奧妙，貫徹群經，學者苟能熟讀深思，如法修行，從十信滿心，得六根清淨，……與十方諸佛，無二無別也。」，又如：「大藏教典卷帙浩繁，求其簡要精深者，莫如起

信論。」在佛法義理上，老居士尊《起信論》，而在行持上，則專教人修習淨土念佛法門，他以為生當今世的「末法時期」，若要解脫輪迴，則勤修淨土，先求得不退轉之境，才是最佳途徑，與友人信函直說：「淨土一門括盡一切法門，一切法門皆趨淨土一門，此是純雜無礙，利根上智所行之道地。」在他的著作《闡教篇》，又力陳：「……夫聖道為十方三世成佛之教，極樂世界亦在內。……然在淨土得忍以後，度生願切者，必回婆娑世界，或往他方世界行大悲利生。」鑑於大盛唐朝的禪宗，在元、明以後產生不少弊端，老居士慨然曾說：「真參實悟者少，而冒充開悟者多，即有真參實悟者，已不能如古德之精純……」他以為要除卻禪門之病，必須先通佛教之義，因此須研讀佛家經典，唯識法相自唐中葉以來即告沒落，老居士不拘泥於淨土、華嚴，他對唯識學也頗為推崇、提倡，曾說：「……專心研究因明唯識二部……不至顛預僂侗，走入外道而不自覺，實振興佛法之要門也。」

楊仁山老居士的「金陵刻經處」，及其所附設的研究會與「祇洹精舍」，是清末光、宣時代國內的佛學重點，因此，很自然的，也就成為佛教界人材薈萃之地，譚嗣同曾回學於老居士，他在給友人的書信上曾說：「本地（指金陵）知名士，曾往拜之，以求學問中

之益……。有流寓楊文會者，海內有名，時相往還，差足自慰。」足見楊仁山老居士的振興佛教，勸人發心念佛求生淨土，成佛之後乘願再來酬度眾生，對於譚嗣同於成政變後，能逃脫而不逃脫，甘心引頸就戮者，實在是受佛教及楊老居士的佛學提倡，有很大的關係，他在《仁學》一書中寫道：「二千年來之政，秦政也，皆大盜也，二千年來之學，荀學也，皆鄉愿也。惟大盜利用鄉愿，惟鄉愿工媚大盜。」從光緒二十三年（一八九七）迄二十四年（一八九八），北上參預新政前在老居士的影響下研究了唯識佛學，在不到一年時間便對佛學建立起「聞一知十」，深入全面的理解，聞《華嚴》性海之說，而悟世界無量、現身無量，無人無我、無去無住，無垢無淨，捨救人外更無他事之理，聞相宗識浪之說，而悟眾生根器無量，故說法無量，種種差別與圓性無礙之理。

譚嗣同居士所著《仁學》一書，在自敘中描述「仁」的廣闊義域時寫道：「『仁』者從二從人，相儒之義也。『元』從二從兒，『兒』古人字，是亦『仁』也，『無』，許說『元』為『無』，是『無』亦從二從人，亦『仁』也。故言仁者不可不知元，而其功用極於無。……」不生不滅仁之體，仁為萬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識。可知《仁學》一書，就是他全面系統地闡述這

種儒、佛融合之維新思想，康有為維新思想的目標乃是建立一個以「仁」為宗旨的「大同世界」，而譚嗣同的《仁學》一書就是徵引儒學思想和佛學思想來詮釋之。

清光緒二十四年，慈禧太后詔命直隸督榮祿，及聯合一大批守舊王公大臣，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，幽禁光緒皇帝及捕殺維新人士，此一滿清末年的重大政治糾爭，史稱「戊戌政變」，在此事變中除了康有為、梁啟超逃入外國使館，沒有被捕獲戮殺外，包括譚嗣同、林旭、楊深秀等共六人皆被捕殺了，其中譚嗣同居士原可逃脫，然而他以如地藏菩薩的誓願：「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。」瀟灑等候在家宅中，讓清廷鷹犬將他捕獲，最後被峻令囚禁，幾天後終被押赴菜市口斬首示眾，其浩然正氣死而無悔之精神，在當年維新、革命派人眼中，皆以仁者、勇者、智者視之，譚嗣同居士無畏無懼捨生取義之舉，直可驚天地泣鬼神，一百多年來的近代史頁，譚嗣同及戊戌六君子之名聲，並不因戊戌政變的失敗而被後人遺忘，他們犧牲精神直可比美革命派的諸青年才俊，把造成政變的領導者康、梁給比了下去。

談戊戌政變的角色，除了可惡的慈禧、榮祿及舊勢力王公大臣，卑鄙的袁世凱、段琪瑞等，懦弱的光緒皇帝及毫無道義的康、梁兩人，在六君子中不能不深談一下譚嗣同，因為譚居士是政變中的靈魂人物，他的犧牲

精神感化人心及轉變人心，間接地促成了十多年後武昌起義的成功，據近代史料記載，武昌起義的成功是一連串的偶然造成的，但不可否認武昌起義的成功是由戊戌政變的失敗所促成，也可以大膽說沒有戊戌六君子的犧牲，沒有譚嗣同的捨生就義，武昌起義是否會發難？是否會成功？可能都是未知數，那對中國近代史將也可能重述重寫，而這改變中國近代史的投石漣漪，就是譚嗣同以仁者及大無畏的精神所造就的，譚居士這種精神的來由，除了本身的家學淵源外，還得自他親近了清末一代大德的楊仁山居士，從親近了楊居士而認識了佛法的廣大精深，以及佛法中的二諦、三學六度和四弘四願大慈悲心，他把這些佛學思想運用到維新思想的論述中，並且無憂不懼捨去執著，以涅槃快樂的最高境界去實踐。

譚嗣同居士除了號長沙壯飛字復生，又自擬了「華相衆生」「通眉比丘」兩個和佛教有關的名號，譚居士接受了佛學思想後，其日常生活、待人接物，便多了許多佛學義理，比如同鄉友人劉淞芙離金陵回長沙前，特來向他道別，譚居士贈他一聯：「帖轆一轉一回顧，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又比如即將北上參預新政時，有一學生唐才智來拜訪，並持一扇請求題詞留念，譚居士知道唐當時有病在身，於是就在扇面上寫了一句：

「我不病，誰當病者。」前者之意，是說只要有了佛陀的智慧，所有的痛苦皆可消除，後者之意，是說捨身就難擔衆生難。在北上北京前，適與妻子李闈結髮十五周年，即寫一詞《戊戌北上別內子》贈愛妻，詞曰：「西方極樂世界，生生世世，同住蓮花，如比迦陵毗迦同命鳥……自度度人，雙修福慧。詩云：娑婆世界普賢劫，淨土生生此締緣……。」日常生活中更以佛陀思想和境界，來警惕覺照自己，如：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多一念不如少一念，生死如夢幻，天地盡虛空，……。」

「世間只有心生滅，賺得悲歡傀儡忙。」

譚居士於光緒二十八年（一八九八年）四月，得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的推荐，被光緒帝徵召入京，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，與林旭、楊兌等人參與新政，新政的維新如火如荼地進行，導致慈禧太后及頑固舊黨王公們的恐慌，極意先出手發動政變，光緒帝志忑不安，遂立即召見楊銳，並讓其帶密詔給康有為，希望康有為等能安速密籌，設法相救。挽救變法，保全新政。九月十四日譚居士奉命在北京法華寺先和袁世凱見面，希望袁能保駕護皇，並能擁護維新壓制舊黨，無奈狡滑老奸的袁世凱，爲了自己的利害竟然出賣了光緒帝及新黨，致使在九月二十一日，由慈禧太后、榮祿等舊黨發動的政變爆發了，光緒帝被幽禁瀛台，譚居士、楊銳等參與新政

六人全被殺害。據梁啟超在事變後寫的《戊戌政變記實》，及譚居士的友人、學生所編的《譚嗣同全集》，提到有革命覺的黃克強及江湖人士王五，曾準備劫獄救出譚居士，卻被譚居士婉拒了，譚居士婉拒他們好意的理由，從他曾在北京法華寺邂逅了梁啟超時，闡述個人對佛法的見解說道：「……《華嚴經》有『迴向品』，主張已成菩薩道的人，還得迴向人間，由出世回到入世，爲衆生捨身，這種迴向後的捨身，才是真正的佛教。但是佛教傳到中國，中國人只知出世而不知入世，只走了一半，就以爲走完了全程，他們的人生與解脫目標是『涅槃』，以爲消極、虛無、生存意志絕滅等，是這種路線的目標，他們全錯了，他們不知道，佛法的神髓，到這裏只走了一半，要走下一半，必須『迴向』才算。……古今志士仁人，在出世以後，無不現身五濁惡世，這正是佛陀所謂乘願而出，孔子所謂求仁得仁，最後，發爲衆生流血的大願，以無我相卻救衆生而引刀一快，而殺身破家，也是很好的歸宿，這才是真正的捨身，就像佛陀的前生是薩陬王子時的捨身飼虎。……佛門精神是先把自已變成虛妄，虛妄過後一無可戀、一無可惜，然後再回過頭，把妄成真，這才是正解，從出世以後再回到入世，這時候真所謂目中有身，卻心中無身，努力救世，可是不在乎得失，進退疾徐，從容無

比，這就是真的佛、真的菩薩……。」「再從譚居士贈與梁啟超的四首詩中，寫道：「同住蓮華語四禪，空然一笑是橫闌。」「徐甲優容心懺悔，願身成骨骨成灰。」

「再世金環彈指過，結空爲色又俄空。」「我佛天親魔眷屬，一時撒手幼僧祇。」，可以說譚居士早已把自己虛幻有形的身體，以及短暫無常的生命看得很開，將「十住」所得諸佛之智、「十行」所行出世之行，濟以悲願處俗利生，一心求願往生後到西方極樂世界，託生蓮華悟無生法忍，花開見佛乘願再來，普救一切受苦衆生。「望門投止思張儉，忍死須臾待杜根，我自橫刀向天看，去留肝膽兩崑崙。」這是戊戌政變後，梁啟超在一八九八年於日本橫濱創辦「清議報」，以當事人身份發表，參與政變的回憶錄《戊戌政變記實》中，有關於譚嗣同居士在獄中所留的「絕命詩」，有人認爲梁啟超篡改了原詩文，只是這經偽改過的絕命詩，其後兩句實在令人激賞，也成爲譚居士的行誼一直爲後人追思。梁啟超將譚的原詩最後一句：「留將功罪後人論。」改成：「去留肝膽兩崑崙。」，除了歌頌此次維新事件，如同崑崙山聖潔崇高，實在是感於譚居士如同佛法中的「捨身」與「回向」精神，「兩崑崙」到底是指誰？又代表什麼意思？衆說云云各有解說，其實比對譚居士曾說過的一句豪語：「不有行者，誰圖將來？不有死者，

誰鼓士氣？」，則知「去」者即「行」者，即期盼康梁逃脫，繼續領導保皇及維新運動，「死」者即「留」者，即譚居士願意留下捨身就死，以鼓舞士氣振作人心，以一己之死來回向給芸芸衆生，期望維新或革命能成功，救生民於水深火熱的苦海之中，這是譚居士如同救苦救難的大菩薩的慈心悲願。

不管譚嗣同居士的思想，由最早的「革命」轉向「維新」，最後又決定捨身一死，以證明當時的贊同維新是錯誤的，足見譚居士不但是「仁者」、「勇者」，更是「智者」，譚居士於政變發生後會見梁啟超時說：「……我在認識你以前，我本來可走革命的路，認識了你，你和康先生正走改良的路，要有幫手的人，所以我過來，……你看了我發表的書，你早就認那些是激烈的革命裏子，……這次政變，本質上是一種戰場上探路的性質，我們探路，證明了改良之路走不通，我決定陳屍在那裏，告訴所有的中國仁人志士，以譚嗣同爲鑑，別再有任何幻覺……。」「補捕前後，譚居士也對黃興派來救援的人說：「……請轉知黃軫兄，我錯了，我的路線錯了，我譚嗣同的想法錯了，我還要對我的錯誤負責任，我願意一死，用一死表明心跡，用一死提醒世人和中國人，對一個病入膏肓的腐敗政權，與它談改良是『與虎謀皮』的，是行不通的，我願意用我的一死，提醒人們此路不通，從今以後，大家要死心塌地，去走革

命的路線，……。」「真是智者之言。」

譚居士原本可以逃遁不死，卻偏偏留在宅中等候朝廷捕捉，固然是想提醒當時世人，維新一路是行不通的，最後被綁赴菜市口殺頭示衆，臨刑時不憂不懼，慷慨激烈地喊出：「有心殺賊，無力回天，死得其所，快哉！快哉！」，應證了譚居士的作爲，誠如同佛們的一則公案：五代後期，全國財政困難，皇帝周世宗下令毀掉天下銅佛像，以用來鑄錢，世宗說法是——佛教以身世爲妄，利人爲急，如果佛本身真身還在，爲了解救蒼生苦難，一定連真身都肯犧牲，何況這些銅鑄的假身。譚嗣同不愧是佛門智、仁、勇三備的居士，令後人懷念他的行誼之餘，更能瞭解佛法的真諦，瞭解佛教並非只是燒香拜佛、唸唸經而已，佛教絕不是迷信，譚居士以世間的力行行出世間的慈心悲願，真可稱是奇男子、真豪傑，以及乘願再來的大菩薩。譚居士「捨身」就義後，對佛法亦有研究，並改變政治主張爲偏向革命的梁啟超，對譚居士的一生做了評斷而慨贊道：復生之行誼磊落，轟天撼地，人人共和……佛言大無畏，蓋即仁即智即勇焉，通乎此，則遊行自在，可以出生可以入死，生可以仁，死可以救衆……。」後來成爲一代國學大師梁任公（啟超）的此一禮贊，譚居士爲「奴種（滿清守舊統治官僚們）長埋地獄（被殺害後，化爲我不入地獄

誰入地獄的地藏王菩薩）」亦可含笑九泉了。民國成立後，國民政府將譚嗣同居士的忠骸歸葬故鄉湖南瀏陽，並立碑營塚以茲感念，墓塚題聯：「亘古不磨，片石蒼茫立天地，一巒挺秀，群山奔赴若波濤。」現在的中國

悼念俊夫居士

陳昭伶

本（十一）月中旬，凌夫人從西雅圖致電告知海刊，俊夫居士已於十月七日往生，並詢問最後一篇遺作〈記譚嗣同居士〉是否收訖。俊夫居士早已罹患肝癌，毅然不接受化療，以信念珍惜生命每一刻，安詳辭世，享年八十五。

經由黃主編轉告此噩耗，不禁哽咽憶起與俊夫居士之結緣，五年前任海刊編輯時，他來函告知一位長期投稿作者之訊息，並希望發表〈悼念劉承符老居士往生四周年〉。收到此文後，立即排入第八十六卷第八期海刊，讀者大眾共同緬懷老居士平凡中的不平凡。自此俊夫居士經常投稿，分享學佛、參訪心得。

投稿過程中有些許不愉快，俊夫居士從西雅圖傳真至善導寺，收到的文稿往往有缺行漏頁，對編輯佛教雜誌不敢馬虎的我，堅持郵寄原稿，而他也堅持縮小再傳真一次。去年，他回臺灣特地撥空至善導寺，說要拜訪我，著實令我受寵若驚，與他相談甚歡。印象中他耿直、虔誠、堅持信念、精進不懈。我以清淨虔誠心祝禱：蓮生化生，彌陀接引。